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马自毅 选注

康有为诗文选



中国近代文学丛书

顾 问

施蛰存 陈旭麓

康有为诗文集

马自毅 选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第 201 号

康有为诗文选

马自毅选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插页:2 字数:190 千字

1995年4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本

ISBN 7-5617-0998-6/H·081 定价:7.20 元

总 序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是社会的转形期，与时代、社会息息相关的文学也处在由旧形态向新形态转化的过程中。但我国学术界对近代文学的研究，相对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研究来说，一向比较薄弱，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形成一个低谷，这可能是由于长期兴盛的古典文学到了近代已趋衰微，适应时代生活要求的新文学又还未能脱颖而出，以其无可观而遂被忽视了。其实就事物的“变”与“常”的关系来说，转形期的近代文学比常态的持久的古典文学更需要研究。近年来这种情况已有改变，有的大学已经开设了中国近代文学专业课，好些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些近代文学资料和论著的专辑，报刊上探讨近代文学的文章也较多了。为迎接这个已经躁动的研究势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特以作家作品为主，编选出版《中国近代文学丛书》，分别介绍各派各家及其代表作品，使读者对近代文学作品的概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也为进一步研究近代文学提供了不少方便，这对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和近代文化思潮都是极有意义的事。

在中国历史上，完整的近代概念，虽然是起于 1840 年的鸦片战争迄于 1949 年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这套丛书编介的作家和作品，仍以习称的“五四”前八十年的近代为范围，这也因为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至“五四”才发生哲学概念上的

质变，才由古典文学正式跨进现代新文学的行列，它的这个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的，比“五四”时期别的领域更显著。然而它不是拔地突起的孤峰，乃是由岗峦起伏的山脉逶迤驰来，我们考察一下“五四”前文化学领域发生的变嬗，即可看出由岗峦到高峰的脉络。

一、鸦片战争后的四十年，中国对科学技术已有明显的追求，对政治、教育也渐有新的憧憬，而文学这个领域却很少触动，仍是汉魏章赋、唐宋诗文。作为古代殿军、近代文学起头的龚自珍，除了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后人外，从他那里还嗅不出什么时代气息。随后出现的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王韬《弢园文录》一类书，其中虽不乏文字优美的文章，但并没有超越《论衡》、《潜书》那种论著的格局。惟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的眼界已朦胧初开，世界景物，海外风云已星星点点地洒落在他们的笔下；他们也发出了为文“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冯桂芬语）的呼声，或“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王韬语）

二、到甲午战争前后的岁月里，经历西学的传播和战争的惨败，迫使人们做出较大的反应。一批慷慨谈天下事的知识分子，开始警悟到士人徒以诗文鸣高，无补于亟变的世务，无补于民族的危安，对之渐作贬斥了。康有为说“士知文而不通中外”，徒然“苟且粉饰”；严复说应“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谭嗣同更在其诗集自叙中说：“天发杀机，龙蛇起陆，犹不自惩，而为此无用之呻吟，抑何靡与？三十年之精力蔽于考据词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这是在痛惩科场试文的同时，进而对徒作“无用之呻吟”的古典诗文的反省，是推动文学改革的信号。由此恣肆通畅的报刊文章通行起来，改

良诗学的“诗界革命”也登场了，出现了一批在政治上要求改革、在文学上有所创新的士人。康有为是个头儿，而“笔锋所至不受检束”的梁启超时务文，“足遍五洲多异想”的黄遵宪爱国史诗，则最富代表性。他们虽然仍未脱古文古诗的窠臼，但俚言译语，中西人物，古今思想，信手拈来，皆入诗文，在旧的形式中装进了新的词汇与内容。正如前此龚自珍所说：“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拒之哉！”这就造成了一代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过渡形态文学，即日后盛称的“旧瓶装新酒”。那时饱受西方教育的严复，他译述《天演论》等书，也还是要把西方的新意境纳入汉魏文章的旧风格中，让人能像诵读汉魏文章那样去诵读。

三、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年，知识界的视野扩大了，新意境增多了，继“诗界革命”之后，而有“戏剧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它们已不止是旧风格含新意境的延伸，而是新意境已在冲击旧风格的墙壁，大量报刊和译著日益发生这种作用，其中又以对小说、戏剧的新认识和发行白话报更具有这种势头。一向被鄙视的小说，在正宗文学里没有它的地位，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发表《本报附印说部缘起》，特别是1902年梁启超创刊《新小说》杂志并刊出他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指出小说对政治、社会的重大作用，小说开始同正宗文学的散文、诗词并称了。尽管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及其他社会小说没有突破旧的章回体，但所涉及的内容和描述的手法，无疑受到了西方文艺的影响，以及对小说的价值观的变化，都在动摇旧风格。戏剧方面，不仅以旧形式演时事新戏，而且出现了与旧形式完全不同的新品种——话剧。为了开民智，为了宣传革新，自1897年裘廷梁发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的呼声之后，1901年《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京话

报》问世，相继创刊了十余种白话报，打破了报刊一律文言文的旧形式。这种报刊白话文不是富有审美观的文学语言，但它是现代文学的基石。不久，新文化运动揭出的“文学革命”旗帜，就是以白话文为前导的。

近代文学的短暂历程，是接受西方文学的挑战，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化过程中推向现代的，其特征是变，新陈代谢的变。1902年，蔡元培选录“当世名士著译之文”，间取“于新意无忤”的先哲遗作，辑为一书，题名《文变》。他在序言中说：“自唐以来，有所谓古文专集，繁矣。拔其尤而为纂录，评选之本亦不鲜。自今观之，其所谓体格，所谓义法，纠缠束缚，徒便摹拟，而不适于发挥新思想之用。”可见他的这个选本。不是《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的续编，乃是《诗经》、《左传》两千数百年以来的“文变”。

“文变”，变了什么？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它的主要变征。新意境是随同外境的变迁而来，受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引导，以新词新义反映民主进步意识，有的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译作，有的是直接观察所得，由此对残暴、欺诈、腐败、愚昧种种社会现象的揭露。除了那些以讽刺谴责著称的小说和龚自珍、金和等人的诗文外，其他千百种近代人的诗文集和杂著都不无这样的篇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大量爱国作品，从张维屏的《三元里》数起，有许多是既富民族激情也很有时代色彩的杰作。新意境的积累不会只满足于旧风格的容纳，势必触动旧风格，梁启超的不受绳墨的新文体，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的创格体，王国维在文艺理论方面的意境、境界说，海派文化带来的艺术新风，不能说不是随着新意境在风格上产生的微变。

这种变嬗中的近代文学，可以从中看到新时代的步伐，是

近代文学的主流。梁启超曾说那个时候，他们“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当然在文学上也逃不出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状态，就时代的跨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古不今、即古即今”的文学，所以我喜欢用“学问不中不西、文章半今半古”来概括他们的风貌，这似乎是从龙钟的古典文学进到活泼的现代文学的必然阶梯。“不中不西”、“半今半古”是就“文变”的迹象而言，必然还有不变者存在，那就是固守樊篱的古文派，它们既有在嘉庆时已中衰，经梅伯言、曾国藩的提倡，自道光后又振兴的桐城派；而曾国藩为文主气势，得友徒的烘托，更被称为入乎桐城又出乎桐城的湘乡派；也有由祁寯藻、程恩泽等对宋诗的推崇，进而衍为陈三立、陈衍、郑孝胥一派入宗宋诗的同光体；还有言必称汉魏的王闿运，所作湘绮楼诗文皆古色斑斓。这些文派、诗派，或拘守性理义法，或生涩模仿，已背离时代，近于僵化，但也不能一笔抹煞，他们席古典文学的余荫，运用成熟的技巧，不是完全没有锤炼出可取的作品来，因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与欣赏常会超越时代而存在。

在新文体与古文学的角逐中，反映了新旧两种观念在文学上的差异，但它们并不等同于政治上的新旧进退。如早年即立志革命又能博采西学的章太炎，他以渊博的学问，条达的理论，发而为凝炼精深的文章，即其论学著作有的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应该说是近代的古典文学巨匠，他却认为文章“有其利而无其病者，莫若魏晋”（《国故论衡》）；刻意摹拟魏晋，采辟词，用古字，成为他的癖好。终因远离生活，他的学问大有传人，而其文章已无嗣响。又如南社是著名的民族革命文学组织，成员大多兼有同盟会会籍，宣传反清，宣传民主，影响遍及东南各省，而其文学实践却是比较保守的。展视二十二集《南

社丛刊》所录诗词和散文，虽不乏佳作，但对艺术的创新，找不到黄遵宪那样的诗人，也没有梁启超那样的笔锋。作为南社巨子的柳亚子，无疑是一个积极的革命家，他留下了七八千首古体诗词，是一位很有影响的诗人，但从风格上说，并没有太多的创新和突破。

“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了近代文学的历程，它是以“文学革命”为号角的，对先前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革命”、“文界革命”和白话报的局部改良是个伟大发展：一、宣传一切文言文是死文学，白话文学是活文学，要求从文学的基石——语言文字开始的全变革，造成国语的文学；二、摒弃一切脱离生活的古典文学，提倡国民的社会的文学。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成为总的趋势，在“五四”前夕 1917、1918 年已展示出来，从此进入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时代。近代的“文变”则是进入这个时代的引桥。我们编辑这套丛书，也是企望它能成为研究近代文学和认识近代社会的引桥。

陈旭麓

1987 年 6 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感国变、哀生民，写身世、抒幽怀”

（代前言）

近代中国是一个新旧递嬗、急剧变化的社会。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火与剑打开中国的大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与之同时，世界近代化的波涛也猛烈地拍击着太平洋东岸的文明古国。为了使祖国独立、富强，赶上时代潮流，一代又一代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走上了寻求救国真理、变革旧制度的艰难历程。康有为曾经是这批人中的优秀代表。他满怀爱国激情，慨然以经国济世为职志，上下求索、殚思竭虑，从古今中外的文化宝藏中寻求救亡图强之道；他孜孜不倦，办学育人，宣传匡时救弊、改革社会的思想；他七次上书，南北奔走，积极参加实际的变法维新活动，无愧为近代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宣传鼓动家。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爱国情思仍萦绕于心，从五大洲搜罗能治沉痾的“神方大药”。由于多种原因，他最终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反而成了时代的落伍者，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但也体现了民族进步过程的艰难曲折和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康有为正是以他的成功和失败，经验和教训，启迪着后来者；而他在历史转折点上所起的开拓性作用以及对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永远尊重与纪念的。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以后又易号更生、更甦。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58年3月19日）生於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敦仁里一个官僚簪缨世家。他五岁即从叔伯们读唐诗，能诵数百首，六岁开始读四书五经，接受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父亲去世后，11岁的康有为即跟着祖父住在连州官舍里，由祖父亲自执教，并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扎实的旧学基础。在祖父任职处，他还看到了不少清廷发到各地的“邸报”，渐知朝廷政事。康有为自幼胸怀大志，成童之时，便有志於圣贤之学，开口闭口不离圣人，乡邻们常戏呼其“圣人为”。惟不喜学做应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十四、五岁时两次考秀才皆未中。1874年他见到了讲述各国史地风俗的《瀛环志略》、《海国图志》和地球图，开始接触“西学”知识。19岁至21岁师从广东著名学者朱次琦，系统学习经史典籍，研究经国济世的实学，学业大进。这三年的苦读钻研在他一生的思想上烙有深深的印痕。然而，作为一个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和前途的青年，他深感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找不到可以解救鸦片战争后江河日下的国势和使祖国富强振兴的答案，产生了传统学问“究复何用”的怀疑。1878年冬，他离师而去，避入当地名胜西樵山中，潜心佛道之学，可仍然未能解决他心中的疑惑和苦闷。不久，他先后游览了香港、上海，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的一些侧面，深感“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头脑中的传统偏见开始动摇了。自此，购买、阅读了当时所能找到的经过翻译的西书，大讲西学，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萌生非变革不足以救国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上书光绪帝，极陈列强相逼、中国危险之状，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希望光绪帝取法泰西、日本，自上而下改革，以挽救国家危亡，这就是他的“一上皇帝书”。由于封建体制的限制和守旧官员的层层阻挠，这封书并未到达皇帝处，康有为反因布衣（平民）上书而受打击嘲讽，谣谗四起。但原稿在一些倾向变革的官员和士大夫中流传，引起很大反响，人们都知道了广东有个不怕闯祸，上书言变法的康有为。

次年夏天，康有为离京南归。回到广东后，一面从事变法理论的研究，一面聚徒讲学，宣传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在这期间，他与今文经学家廖平晤谈，获得很大启发，多年苦思之“道”一旦豁然贯通。他融汇今文经学的“三世”、“三统”说，儒家学说中的小康、大同理想，以及他所理解、吸收的西方历史、政治、社会学说和进化观念，构筑成自己的变法理论体系；并向维护封建专制的僵化的“旧学”进行挑战，写出了有“火山大喷火”、“飓风”、“地震”之称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借用孔子的权威，宣传人类社会必须由据乱世（封建专制）到升平世（君主立宪）再进入太平世（民主共和）的社会发展观，确立了变法理论。

1895年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与日本签订了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被迫弃朝鲜，割台湾，赔偿二亿两白银。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到都察院递交由他起草的上清帝书，强烈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要求，这便是著名的“公车上书”。自此，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想迅速发展为实际的政治运动。

继而康有为又先后五次上书光绪帝，纵论天下大事，并撰写或代人起草了许多奏折，针对中国实际情况，提出变法的纲

领方针和具体措施。光绪帝见到了这些上书和奏折中的一部分，很受感动；其余的虽为顽固派所阻，未能上达，但手稿在京内外广泛传抄，在那些热爱祖国、赞同变法的开明官员和士大夫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或同情。与此同时，康有为还向光绪帝进呈了自己编纂的《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记》、《波兰分灭记》、《法国革命记》等书，用各国盛衰兴亡的历史，反复宣传“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观点，强调在列强四逼的状况下，“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上清帝第五书》）并用“革命”这个怪物吓唬光绪，他多次言及陈胜辍耕於陇上，法国革命“君后同囚，并上断头之台”等中外革命的“惨景”，敦促光绪在土崩瓦解之前下决心变法。

为了唤醒中国各阶层救亡图存，康有为和他的同志们在向最高权力中心提出变成法的政治要求的同时，也做了大量启蒙、宣传和组织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开学会、办报刊。他们认为这是开风气、联人材、伸民权的重要方法，由此可以启迪民智，矫治民众愚昧保守、自私自利的痼疾，改变“四万万人为四万万国”的人心涣散状况，增强抵御外侮，挽救危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在他们的发动和积极参与下，全国各地先后组织了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滇学会等七十多个不同类型的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湘报》、《知新报》等十数种报刊。这些学会、报刊是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维新的前沿阵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不准庶人议政的旧的政治、社会结构，对改变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社会风尚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在内外部形势的推动下，“不甘作亡国之君”，且希望真正掌实权的光

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维新。四月二十八日召见了康有为，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命他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以后又予以“专折奏事”的特权。康有为则进一步向光绪陈述了变法的方针和各项具体事宜，夜以继日地编书上折，提出各种新政建议，以答光绪的“特达之知”。

自变法开始至八月初六（9月23日）政变时为止，光绪先后颁发了百余道推行新政的上谕，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但这些诏令在基本上由顽固守旧官员把持的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机构中，皆成一纸空文。除湖南等极少数地方，各地官僚大都采取阳奉阴违，甚至公开违抗的态度。而作为晚清实际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自然也不能容忍光绪抓权的行为，经过一番准备，于八月初六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废止一切新政措施，慈禧再次“训政”。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杀，参与新政的官员多半被逮捕、流放或革职。历时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政变发生后，清廷发布多道上谕，重金购买“要犯”康、梁的头颅，二人在外国公使的帮助下，先后出逃，开始了流亡生活。康有为先经香港赴日本，然后又去加拿大，在华侨中组织保皇会。之后又相继旅居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地，从事理论研究，写成了《礼运注》、《孟子微》、《春秋笔削大意微言考》、《中庸注》、《论语注》、《大学注》等一批著作。1902年在印度大吉岭完成他的又一部名著《大同书》的手稿。

这时，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发动武装起义，争取推翻以满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这是当时中国真正的希望之所在，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但康有为却落伍了，拒绝孙中山多次邀约合作的会晤，视革命为洪水猛兽。诚然，他一如既往，是一个爱国者，也是一个以

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但他毕竟生长在封建意识、封建制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带有太深的封建烙印，体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塑造了他的知识结构、人格气质及心理倾向。为帝王师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耀和满足，光绪帝的“特达之知”更使他感恩不尽，他无法冲破这个由他自己设置的心理障碍，保皇也就是保他自己的声誉地位。这个障碍使他从追求真理滑向谬误，在戊戌的鲜血流过之后，还死抱着“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宗旨。同时，康有为亦自视甚高，总以拯救四万万生民的先知先觉者和救世主自居。在这样的思想和动机下，康有为数次周游世界，足迹遍及亚、欧、南北美、非四大洲三十余国，要当“遍尝百草”的神农，寻找起死回生、“治中国沉痾”的“神方大药”。但落后于时代的康有为，无论其主观愿望多么美好，所开出的药方只能是不适合当时中国现实的“立宪”。他发表了一系列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文章、演说；在清王朝行假立宪时，他迫不及待地吧海外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打起“尊亲皇帝，扩张民权”的旗号。可清廷并不理睬他，仍视其为心腹大患，没有取消重金购其脑袋的诏令，他那颗价值十万两银子的头颅仍有随时掉下来的可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烈火，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中华民国，长达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自此寿终正寝。康有为在日本听到这个消息，急忙抛出《共和救国论》等几篇反对革命的文章，提出“虚君共和”的主张，企图保存已成为历史遗迹的清王朝。

1913年秋，康有为回到阔别十五载的祖国，以遗民自居，创办《不忍》杂志，当上孔教会会长，竭力鼓吹“以孔教为国教”，莫祭正在被革命的新青年们批判的封建亡灵。1917年夏，

他还与张勋等人一起拥戴废帝溥仪的复辟，又一次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此后十年，康有为漫游全国各地，这时他已白发苍苍，垂垂老矣。虽仍鼓余勇，重操教育事业，1926年在上海创办天游学院，期望薪传无尽，以传其道，然事实上在各方面均已失去万木草堂时代的朝气与活力。他对亡清的感情亦依然如故。1924年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次年住进天津张园，康有为不顾年迈体弱，赶到天津去“觐见”；溥仪大婚时，亦“望阙行礼”，赋诗祝贺；还参加恭祝“圣寿”的活动。

1927年3月21日（农历二月十八），康有为病逝於青岛，终年七十岁。

二

作为一个在中国启蒙思想史和近代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启蒙思想家、宣传鼓动家和诗人，康有为写了许多有独特风格与魅力的文章和诗歌。由于他一生变化很大，表现其思想和心灵的诗文的主题与风格的变化也同样很大。当他站在时代前列时，诗文中充满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追求真理的坚毅果敢，以及同旧势力作不妥协斗争的英勇气概，笔锋犀利，豪爽明快，意气风发，有振聋发聩、荡心动魄的力量和气势；而当他落伍于时代时，其作品则带有浓重的颓唐、没落、凄凉、哀伤的情绪。下面分别对其散文和诗歌作一简要介绍。

康有为的散文，就其内容和体裁，大致可分三类。一，政论文，其中又可分为二期：前期以七上皇帝书和戊戌时期的奏稿为代表；后期主要是流亡时期写的一些文章和归国后发表于《不忍》杂志上的文章；二，书信、序言之类的杂文；三，流亡

异域期间写的长篇游记。

他早期的政论文都是“为时而作”，反复强调封建成法已腐朽到极点，强调在列强四逼，亡国迫在眉睫，中国处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局时变法维新的必然性和紧迫性。这时期的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战斗性，饱含政治热情，大笔淋漓，写得虎虎有生气。他以敏锐的目光，深刻的洞察力，抓住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广征博引，反复阐说，逻辑严密，层层深入，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强烈地震撼读者的心灵。如在《强学会序》中，康有为开门见山，寥寥数句，极形象而鲜明地勾画出在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下中国的危势：

“俄北瞰，英西睨，法南隣，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辽台茫茫，回变扰扰，人心皇皇，事势僂僂，不可终日。”

他在上皇帝书中更是以极其尖锐的言辞，直陈内忧外患，警醒光绪帝和官员们：

“夫自东师辱后（即甲午战败），泰西蔑视，以野蠻待我，以愚頑鄙我。……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教堂遍地，无刻不可起衅；矿产遍地，无处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剥削无已。……蚁穴溃堤，衅不在大。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加以贿赂昏行，暴乱於上，胥役官差，蹙乱於下，乱机遍伏，即无强邻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生机已尽，暮色凄惨，气象如此，可骇可